

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伦理思想

朱玲莉, 朱 懿

[摘 要] 吉田松阴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作为改革派武士,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积极开展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他在松下村塾任教期间,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既强调封建道德的作用,提倡无论是武士还是平民都要加强伦理道德修养;同时,他因材施教,注重弟子个性化教育,培养了大批的维新志士。这些改革型人才的培育,加速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 吉田松阴;道德教育;松下村塾

[作者简介] 朱玲莉,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朱 懿,湖南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

DOI:10.15995/j.cnki.llxyj.2022.05.003

吉田松阴(1830—1859)作为日本江户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以明治维新的改革派精神领袖形象为大家所熟知。他出生和成长在日本自然灾害和社会暴动频繁发生的天保年间(1830—1844),这一时期由于幕府的天保改革失败,欧美列强频频扣敲日本的国门,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江户幕府的统治之下,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改革武士派,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进行推翻幕府的倒幕运动。吉田松阴积极向西方学习,通过教育培养革新之士,他曾在松下村塾开展教育活动,培养了许多日本明治维新的精英人物,如木户孝允等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型人才。他的学生中有的是倒幕维新的核心成员,有的是明治新政府的领导力量,这些人才的培育积极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

一、吉田松阴的教育背景

日本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炸的时代”。在江户德川幕府倡导的“文武两道”的文教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民族文化不断发展且趋于成熟,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普及。其间,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机构主要分为官办学校(德川幕府直辖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藩校(藩内武士子弟的教育机构)、私塾(汉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寺子屋(初等教育机构)、乡学(初等教育和平民的高等教育机构)等几种形式,另外还有医学馆等专门的洋学教育机构。吉田松阴所主持的松下村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孕育而生的。

吉田松阴从小过继给作为长州藩兵学教师的叔父,并跟随叔父学习山鹿流兵学。在学习兵学的同时,吉田松阴还在松下村塾学习一些传统的汉学课程。其后他到长州藩藩校“明伦馆”开始正式学习山鹿流兵学,后来成了藩校“明伦馆”的兵学教师。1851年吉田松阴到江户游学,在学习期间,吉田松阴深感山鹿流兵学已经落伍过时,日本要想强大就必须学习西洋先进的技术,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来抵御外敌。1853年,吉田松阴再次来到江户正式拜日本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为师,决心学习兰学和西方的军事技术。同年美国佩里率军舰“黑船”抵达日本,要求德川幕府开港通商。吉田松阴看到美国舰队的船坚炮利之后,自感“吾国之弱小无抵御之力”^{[1](17)}。1854年,美国军舰再次来日,强迫

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从此日本国门被打开。此时，吉田松阴再次痛感幕府的无能，企图趁机搭乘美国军舰偷渡留洋，事情败露后被以“叛国罪”押送回长州藩，监禁于野山监狱^{[1](17)}。在野山监狱，吉田松阴勤奋努力，翻阅了许多历史哲学、文学典籍等方面的书籍，并著述了《野山狱读书记》、《幽囚录》和《狱舍问答》等书籍。在狱中，吉田松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传承自己的远大志向。于是他在狱中就开始开展一些教育活动。1855年出狱后，吉田松阴被圈禁在家“闭门思过”。1856年9月，为了弘扬自己的倒幕志向，吉田松阴进入叔父的松下村塾讲学。私塾开始只有几个弟子，到后来则声名大振，各地前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松下村塾改变了江户时期教育的阶级性，提倡士庶共学，摒弃了师生之间的繁文缛节，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培养了自由质朴的新学风。1858年6月，幕府先后与美英等国缔结不平等条约，日本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倒幕运动迫在眉睫。吉田松阴号召武力讨伐幕府，制订刺杀幕府重臣的计划。由于刺杀计划泄露，他再次入狱。在幕府大佬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押解至江户，同年10月被杀害，年仅29岁。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者，虽然受其教育的弟子只有92人，但是这些弟子在明治时期被授勋者多达37人。大多数弟子成了倒幕维新和明治新政府的领导者和核心力量。

二、以维护封建秩序为主的道德价值论

众所周知，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实行武家政权组织严密的幕藩体制。在兵农分离体制下，武士（兵）彻底脱离农业生产，离开村庄而迁居都市，成为统治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农）世代代束缚于农田，每年交纳年贡来维系武士阶级的生活支出。人们根据身份、门第等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和“四民”以外的贱民。他们在社会地位、职业、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不可逾越，等级森严。

在这种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下，吉田松阴作为江户时期的武士阶级，即使在幕府处于风雨飘摇、“士风日下”即武士阶级道德水平下降的时期，他仍然坚信维护封建伦理秩序是治理天下的关键，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语天下之至论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天下岂有不平哉。然则天下之不平者，在于君不君则臣不臣，臣不臣则君不君也，二者常相待而后天下不平”^{[2](94-95)}。臣子始终是君主的臣子，为君主所用，做好随时为君主献身的准备。在吉田松阴看来，积极维护以往的封建等级秩序才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核心内容。

吉田松阴倡导的这一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依据在于武士的职责是出仕于君，统治三民。他认为：“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3](99)}吉田松阴坚持封建身份制的道德观，肯定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的存在，强调士农工商各有其责，而作为“四民”之首、“三民之长”的武士阶级不同于从事农工商那样的职业，是统治阶级。

到了幕末时期，武士的“士风”道德素质日趋下降，吉田松阴批判这种武士风气，想竭力挽回武士在封建社会中的高大形象；同时，他也要求平民加强道德品质修养，试图维护以往的封建统治秩序。他认为“志”为士的标准，有两层含义：一是激励武士成为理想的武士；二是要求庶民中的有志之士积极实践“士”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使其为维护身份制社会秩序服务^{[4](121)}。从这里可以看出，吉田松阴认为武士和平民的教育目标是不同的，即武士教育是为了培养更优秀的统治阶级之“士”，而平民教育则是通过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更好地维护原有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

同时，吉田松阴除了对武士和平民道德教育进行阐述以外，还强调武士和庶民在道德认知上是有差别的。因此，他认为不同身份的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也各异。例如，“学问之道，要在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其所异者，无外乎五伦五常之得与失。失之则为庶民，勤而得之则为君子，从容自存者为

圣人。虽云众人,勤励则为君子,至其功熟,即圣人也”^{[2](112)}。他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圣人、君子等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人物,以此来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具体而言,吉田松阴认为武士和町人虽然同样是社会之人,但对他们要求的道德内容却各异。“夫屋宅极尽美丽,居间唯求便利,地板之置物,挂件,屏风,障子……商买町人者不苦之。苟为居于武士之籍而行搜集之举,非诚为可耻之事乎?”^{[3](113)}武士如果做了町人所做的不好的事情,就是可耻的,应当批判。吉田松阴强调平民教育可以不用太复杂,相对简单就行。与平民内在的道德修养相比,吉田松阴更关心的是外在的平民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服从。由此可见,吉田松阴的伦理道德修养论最终也没有超出封建教化的范畴^{[4](120)}。

三、松下村塾的道德教育论

吉田松阴的伦理道德理念也在他曾执教过的松下村塾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松下村塾是日本江户末期著名的私塾之一,因为培养了大批明治维新之士,曾被喻为“明治维新胎动之地”。它位于日本山口县,1842年由吉田松阴的叔父玉本文之进创办,后由久保五郎左卫门在其私宅续办。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1855年被幕藩勒令在家“闭门思过”,这期间大批塾生前来求教,于是吉田松阴成为该塾的教师,1857年后成为塾主。1859年吉田松阴被处死后,该塾由玉本文之进和杉民治等人继续兴办,1892年停办。由于当时是幕末时期,日本处在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时代,吉田松阴时常忧国忧民,提出了“一君万民”的号召,主张“尊王攘夷”的政治思想。在师匠决定私塾性质的江户时代,松下村塾的教育理念以及教育内容,也是围绕“尊王攘夷”这一主题开展的。由此可见,松下村塾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性的私塾。吉田松阴希望通过“村塾宣传正义,培养国家之栋梁,维系天下之太平”^{[5](46)},即“村塾虽简陋,将成为神国之支柱”^{[6](224)}。

首先,松下村塾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吉田松阴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育至上。他提出求学即是求道,其中的“道”就是让人明白何为五伦。因此,在教育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以伦理道德教育为中心,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是人明白伦理道德”^{[7](10)}。吉田松阴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上明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辩,下不失孝义忠悌”。吉田松阴曾在松下村塾的题记中强调:“学,学所以为人也。”“为人”是“为人之道”,即“入则孝悌,出则忠信”的“为人之道”^{[3](52-53)}。

吉田松阴在《士规七则》中的第一条便提到了“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8](227)},以此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他在“松下村塾规则”中规定:第一,不可违背父母之命;第二,应告知父母自己的行踪;第三,要晨起洗漱,拜祖先,朝着城堡方向叩拜君主,朝东叩拜天朝,即使生病也不能懈怠;第四,对兄长年长且地位高之人,不得无礼,一定要恭顺,要爱戴年幼的弟妹;第五,入塾、退塾以及塾内之间的交往都要礼仪端正。第一条为基础,违者罚坐禅,其他则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罚^{[9](292-293)}。这些规则不仅规定了弟子在私塾中的行为举止,还规范了弟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行为 and 道德规范。

在教育评价制度上也体现了松下村塾教育对道德的重视。松下村塾根据弟子的日常品德,以及在学业上的勤勉程度设定了“三等六科”的评定标准,即“古人有月旦之评,今且为子弟,设立三等,分为六科,各标其所居,月朔升降,以念其勤惰。曰进德,曰专心,是为上等,曰励精,曰修业,是为中等,曰怠惰,曰放纵,视为下等。三等六科,志之所趋,心之所安,无为而不可,诚使邑人皆进为上等之选”^{[10](437)}。思想懈怠、不精于学业的弟子为下等;精于学业并励志的弟子为中等;品学兼优的弟子为上等。松下村塾的这种依据弟子道德品质的优劣和对学习的态度、不考虑学生的成绩分数等其他因素而制定的“三等六科”的评价制度,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教育评价制度,充分体现了吉田松阴重视弟子道德思想和松下村塾教育自由性的特点。

其次,松下村塾十分重视教育平等。吉田松阴认为社会有身份等级之别,承认人性差别的存在。

他指出:“人有三等。下等之人,不合于义,不信不果之徒,是妄人也。中等之人,必信必果,未必合于义之徒,是游侠之类也。上等之人即本文所谓大人,不必信,不必果,惟从义之所在而行之人也。若泛论人品,中等之人亦非易得,勿轻之。然至于为学者,舍上等何所学乎。”^{[2](108-109)}人虽然天生有别,但他认为弟子无论天资如何,只要勤奋好学都能学有所长。他强调“人性皆善,圣人亦与我同类者也”^{[2](150)}的“性善论”。他认为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只要是有用之才都可以为国效力,对有志之士都欢迎接纳。“人虽有贤愚之别,但每个人都有一两个长处。因此,成就大事者要善于发现他人之长处,将这些长处发挥出来。”^{[11](158)}同时,他提出:“天下之人皆为国之臣民,无论是谁,只要是有才干就应竭尽所能为国效力,在能力上不应有武士庶民贵贱之分。”^{[12](194)}我们从松下村塾的弟子身份构成中也能看到这一点。从安政三年(1856)3月到野山再狱的安政五年(1858)12月,来松下村塾学习的弟子共92名。其中武士有76名,除此之外,还有医生、僧侣、商人等^{[13](117)}。弟子年龄不一,最小的9岁,最大的36岁。松下村塾门生的平均年龄约18.6岁^{[13](119)}。松下村塾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无论年长年幼只要有志学习者均可入塾学习。在松下村塾中,与那些传统儒家教学尊师重道不同,吉田松阴在教学上从弟子最感兴趣的地方着手,因材施教,不断启迪学生,发现弟子们的长处,激发他们的学习激情,培养他们精诚团结的合作精神。吉田松阴的这种教育平等、积极招纳各阶层贤才的思想,在当时危机四伏的日本幕末时期,对日本教育冲破束缚并开启近代化的进程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最后,松下村塾在教育的内容上也体现了吉田松阴的道德教育理念。在日本江户时代,无论是幕府官办的直辖学校还是地方各藩的藩校,都要求武士重视文武两道。吉田松阴自己是武士出身,从小学习兵法,后来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兵学,因此通晓文武两道成为其后来执教松下村塾的宗旨。在松下村塾的教育过程中,他十分重视武道的学习,认为“习武艺,论武艺,阅武器”^{[3](105)}这三件事是武士每天必须做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强调诵读中国古典经书,提高自身修养和品性。他提出要学习真武真文^{[14](88)}，“不要形成无礼无法,粗暴狂悖的偏武”，同时他也警告弟子“不要只记诵辞章，浮华文柔，要学习真武真文”^{[3](98)}，只有掌握文武两道才能为君主为国家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武士。松下村塾的整个教学活动一直围绕吉田松阴的这一道德教育理念展开，它也成了日本私塾的典范。

在吉田松阴的这种重视文武两道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松下村塾使用了大量的汉学教材,主要有《左传》《资治通鉴》《孟子》《孔子》等,此外还有赖阳山的《日本外史》以及充满“尊王攘夷”色彩的会泽正志斋(1781—1863)的《新论》等日本书籍。他还鼓励弟子博览群书。吉田松阴在《土规七则》里提出:“立志以为万事之源,择优以辅仁义之行,读书以稽圣贤之训。”^{[7](10)}吉田松阴告诫弟子读书,应读圣贤之书,遵圣贤之训,专心学道才能明晓事理,通达古今。在“村塾记事”中写着“天下之书,盖有四大别,曰经、史、子、集,通习四者,各究其精,是谓博学”^{[5](542)}。他重点采用了“二十二史及资治通鉴各自为课”^{[5](542)}的筛选方式,要求学生要用心去读书,用心去理解“忠信孝悌”的真谛。吉田松阴认为弟子要勤奋努力,达到“为人之道”的标准,即“人唯一心,心唯一诚,以是事君则忠,以是事父则孝,以是事官长则敬,以是诲子弟则友,是其义也”^{[3](18)}。松下村塾为丰富弟子们的学习生活还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讨论活动,涉及如世界形势与日本现状、藩政改革和幕府改革等具有政治色彩的话题。

为了更好地实施道德教育,他认为“人性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单纯地通过语言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和体验生活的机会。因此,作为教育者必须要尽最大努力净化和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7](10)}。松下村塾力图让学生们在理想的教育氛围中学习,并且通过老师合理的指导来达到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之道德教育目的。

松下村塾在教学环节中还安排了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以此来提升弟子们的道德情操。教师除了

传道授业解惑、丰富弟子的学术知识以外,还经常开展射击、剑术、操枪、登山、游泳等体育锻炼,“定于每月十二日为野外郊游日,近则一二里,远则五六里,大家一起练习击剑和射击而后回塾”^{[5](309)}。吉田松阴因为当时待罪被圈禁在家,因此类似这种室外实践活动无法参加,但是他率领弟子在私塾旁整队操练,以竹刀代替枪炮进行射击训练^{[9](355)}。通过这些野外锻炼,弟子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而且锻炼了坚强的意志。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常一起生产劳动,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谈论历史、讨论时事,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营造了一个和谐、相互尊重信赖的学习氛围。而且,吉田松阴注重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根据弟子们的特点,启发引导弟子明确学习方向、确立学习目标。他经常通过书信对弟子进行个别指导。在松下村塾执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给门生的书信约有70余封^{[15](20)},对弟子进行明确化的个性指导。

松下村塾的教育实践活动不拘泥于本私塾内,他们还经常和其他私塾的学子进行学习交流。在日本江户时代,私塾的学习生活也相对自由。弟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在私塾学习的时间长短,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几个不同的私塾学习。松下村塾经常和育英馆(阿武郡须佐村)私塾进行交流。育英馆的馆主益田弹正曾跟随吉田松阴学习兵学,和松下村塾的弟子关系密切。两个私塾的弟子不仅在学术上经常交流,还在政治领域等方面相互切磋。其后,松下村塾和其他私塾的弟子到日本各地游学,作为“吾党之士”积极开展倒幕运动。

四、吉田松阴的女子道德教育论

在江户时代,日本出现了文化复兴的新局面,各种学派百花齐放,学者辈出。尤其是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学术发展,教育机构林立,识字人数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16](85)}。在日本幕末时期女子教育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作为改革派先锋的吉田松阴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他所写的《女训》,收录在其著作《武教全书讲录》的“子孙教戒”章中。在《女训》中,他首先阐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女子道德教育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命运。“今世往往闻淫佚之妇,而至于贞烈之妇则寥寥乎绝响,然则礼仪虽聊存其旧,其义已泯没。余常窃过忧之,以为乱亡之先兆。”^{[3](128)}同时他还强调女子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夫妇乃人伦大纲,父子兄弟由此所生。一家兴衰治乱之界,全赖于兹。故不可不先教诫女子。无论男子何等刚强秉直,恪守武士之道,妇人失妇道,则一家不治,乃至子孙之教亦废绝,岂可不慎哉。”^{[3](129)}“凡禀生于天地之间,无论贵贱,无论男女,不可使一人逸居,不可使一人无教,然后始可谓合于古道。”^{[3](129)}吉田松阴虽然认为男女不论贵贱,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也强调女子教育要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古道”。

为了保证女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吉田松阴建议设立女子学校^{[3](128-129)},并且设计了一个女子学校的蓝图:“可于国中设一处若尼庵之所,号曰女学校,选士大夫之孀妇数名,年四五十以上,贞洁素显,通学问,能女红者为女学校之师长,寄宿学校中。令士大夫女子,年八岁或十岁者,每日去学校,或依其愿许寄宿。专练习字,学问,女红等事,教法要极严整。”^{[17](108)}可以看出,他在女子学校教师的选择、学生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在女子教育的教材方面,吉田松阴认为应“以柔顺为用,以果断为致”,两者兼备才是最理想的教材。其中《武家女鉴》三卷甚佳,妇女读之,无不受益。这本书由日本著名儒学家津阪东阳(1757—1852)所著,天保十一年(1840)正月刊行,分为三卷,其间还穿插着部分中国女性的故事。

吉田松阴还很重视妇女的言传身教,他在给妹妹千代的信中强调了女性在教育十岁以下的幼儿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并且还应该进行胎教。具体而言,“但凡人子,聪慧愚昧好坏,皆

由父母教诲而养成。男子多受教于父亲,女子多受教于母亲。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只是语言教育,还需有自己的言行示范给孩子看,就连胎教也不要放松,怀孕期间应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作为妻子应该孝敬公婆,应该崇敬神明,应该重视亲族和睦”^{[17](108)}。吉田松阴突出强调了女性对下一代的影响力。人的教育在于家庭,家庭的子女教育在于母亲,由此可见重视女子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吉田松阴作为日本幕末时期的思想家,深受中国儒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始终铭记着时刻为君而生、为君而死的信念。他的教育思想影响着松下村塾的教育活动导向,也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弟子的人生轨迹。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强调道德至上,号召松下村塾的弟子献身于“尊王攘夷”的大业。他在松下村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打破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士庶共学。同时吉田松阴也重视女性教育,为女性教育设计了未来蓝图。但是,吉田松阴在教育中所提倡的“尊皇论”,认为国家的兴衰尽在天皇,君臣关系才是“天下平”的关键,并提倡不论平民还是武士,都应随时随地竭力效忠天皇。吉田松阴的这些思想,在明治维新后持续发酵,成为后来日本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吉田松阴的教育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 [1]朱文富,郝雪.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
- [2]吉田松阴.讲孟余话[M].广濑丰,校订.东京:岩波书店,1936.
- [3]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3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9.
- [4]唐利国.两面性的日本近代化先驱: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J].世界历史,2016(4).
- [5]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9.
- [6]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6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9.
- [7]汤川宗一.松下村塾とその教育[J].教育学杂志,1976(10).
- [8]广濑丰.吉田松阴の研究[M].东京:武藏野书院,1983.
- [9]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10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9.
- [10]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M].东京:岩波书店,1939.
- [11]玖村敏雄.吉田松阴の思想と教育[M].东京:岩波书店,1942.
- [12]海原徹.近世私塾の研究[M].京都:思文阁出版社,1982.
- [13]海原徹.松下村塾の人々:近世私塾の人間形成[M].京都:ミネルウェア書房,1993.
- [14]鲁霞.松下村塾教育的历史断想[J].大连大学学报,2005(3).
- [15]犬饲喜博.吉田松阴的教育和思想[J].教育学杂志,1986(10).
- [16]王桂.日本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
- [17]岳倩.从《女训》看吉田松阴的女子教育论[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1).

(责任编辑:谢 超)